

教育徵文選



澳門中華教育會
成立七十五週年會慶
1920 - 1995

目 錄

序言.....	陳忠文 (2)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澳門教育.....	劉羨冰 (3)
試論教育在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何少金 (18)
淺談“民主的人際關係學說”.....	李明基 (25)
聯繫工作實際，談談學習當代外國教學 思想的體會	張育增 (34)
論興趣在教學中的重要性.....	馬克平 (42)
兒童心理與教育之探討.....	郭瑞萍 (46)
有用、有趣、有系統.....	葉錦添 (54)
發展兒童的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以培養他們的 閱讀能力.....	陳玉瑰 (58)
談談對培養學生寫作能力的認識.....	黃淑珊 (62)
寫作教學中思維能力的培養.....	呂培卿 (66)
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鄭金標 (72)
如何上好數學課.....	楊萬忍 (75)
中學數學課常用的教法.....	石 瑋 (86)
發展思維，培養能力 ——數學教學深化拓廣的根本 方向.....	鄭志民 (90)
用“平移法”探索一題多解.....	蘇燦輝 (109)
Input Quality & the Language Cont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Sylvia S.L. Leong (116)
中學地理教學的探索.....	梁銘釗 (126)
澳門學校圖書館利用教學的實施綱要與單元 設計舉例	王國強 (134)
後記.....	工作小組 (144)

序 言

我有幸拜讀了即將出版的《中華教育會成立七十五周年徵文選》，作為一個關心澳門教育但又知之不多、瞭解不深的人，我讀後深感獲益匪淺。它匯集了澳門教育界近期內的部份研究成果，反映了澳門教育改革取得的進展，這本書的出版將會有助於宣傳和交流澳門教育和教學改革的經驗，促進澳門教育的發展。

《徵文選》使我們看到澳門教育的光榮傳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澳門教育曾經有過蓬勃發展，這是澳門人的寶貴財富，它使我們增強信心，消除那種“妄自菲薄”的思想，只要我們齊心努力，善於抓住機遇，澳門教育可以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徵文選》使我們看到澳門有一支可敬可愛的教師隊伍，他們在完成日常繁忙教學任務的同時，一刻不停地努力學習教育理論，提高專業知識水平，以適應當今“知識爆炸”的新時代。他們對於教學工作，精益求精，運用教育理論，創造性地進行教學。他們既教書又教人，巧妙地通過教學實踐，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

《徵文選》使我們看到澳門教育正在經歷著深刻的改革。教師們正在摒棄那種灌輸式的教學方法，結合各學科的特點，引導學生生動活潑地學習，使學生對學習有興趣，樂於學習，發揮學生在學習中的主動性、積極性，教師在教學中不再是單純傳授知識，同時也重視發展學生思維，培養學生能力。

《徵文選》也向我們提出了澳門教育中急待改革的問題，諸如教育結構如何適應澳門經濟發展的問題；學校管理、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革問題等。

世界正處於新舊世紀交替之際，澳門正處於回歸祖國的前夕，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轉變時刻，澳門教育面臨著挑戰和機遇，讓我們共同努力，把澳門教育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為二十一世紀建設新澳門培養高質量的人才。

陳忠文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
於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澳門教育

商訓夜中學 劉羨冰

一、抗日戰爭前夕的澳門教育概況

二、澳門教育在國難中大發展(附表)

三、抗日戰爭對本澳教育、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第一、澳門教育素質出現一個飛躍

- (1) 愛國主義教育空前高漲
- (2) 學生思想面貌煥然一新
- (3) 喚起民眾 師生發揮宣傳尖兵作用
- (4) 血薦軒轅 師生用生命寫下壯麗詩篇
- (5) 澳門教育專業性大大提高
- (6) 校園文化蓬勃發展

第二、澳門人口素質相應提高

- (1) 整體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
- (2) 澳門人口思想素質的飛躍
- (3) 民族意識增強，團結自救成為普遍認同的行為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澳門教育影響很大。

1937年—1945年，中國人民經歷了八年艱苦抗日，全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澳門從1937年底開始至香港陷入日本侵略者手中這幾年間，再一次成為鄰近地區的避難所，作為一塊小小的中立地區，一時人口驟增，人才薈集，名校林立。深重的國難意外地造就了澳門教育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

一、抗日戰爭前夕的澳門教育概況

澳門教育向以私立學校為主，學校、教師和學生均以私立的佔絕大多數，私校間素質十分懸殊。最負盛名的是美國邊麻大學教育碩士、著名教育家廖奉基女士辦的粵華中學，學生參加廣東省會考，是全澳唯一的華人高中。南海師範學堂及兩廣優級師範學堂畢業的梁彥明先生，創辦崇實書塾，1932年改辦初中，也有很高的校譽。天主教教會辦的中學，有聖羅撒女子中學，聖若瑟男、女中，也是初中。此外，還有尚志、華仁、華僑、佩文、復嶺等中學，也只辦初中，而且學生人數也不多。其中不少稱為學校的，實際上是從學塾演變過來的。官校方面，有葡文中學和商業學校，葡文小學和兩所收容華籍貧童的葡華小學，另有兩所官協民辦的民主學校。

1932年，澳葡官方統計，全澳中、小學學生7953人，女生只佔26.6%，學校97所，平均每所只得81.98人。

內地出版的《華僑教育》1934年派兩名編輯來澳實地考察，他們的報告中，認為全澳華校70多所，學生約7,000人，平均每校約百人。以當年人口12萬計，學生約佔人口的6%。可見30年代澳門教育受社會發展的局限，教育很不發達。他們描述當年的華人中學，把小學加設進修的兩、三所湊合起來，也只得八所，

學生僅 350 人，①平均每校不足 44 人。每 342 個澳門居民中才有一個在讀的中學生。當年澳門與鄰近的廣州、香港雖然並稱“省、港、澳”但教育方面，澳門確實比其他兩地落後得多。

這些華人私校大多數在澳葡政府華務局附設的華視學會督察之下，其中有規模的、學生要入內地升學的學校又另在南京政府僑務委員會註冊立案，遵照其規定的中、小學規程標準的。但仍有不少處於被淘汰中的私塾，或廟宇的義學，30 年代還是舊式的“卜卜齋”教育。這一時期可稱為封建教育過渡到新式教育的晚期，先進與保守共存。據《華僑教育》編輯考察發現，仍有澳門學校採用 1916 至 1917 年間出版的過時教材，教科書上印的“國旗”，還是“五色旗”，澳門私校質量的參差，由此可見一斑。這也是澳門私校生生滅滅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象。

另一方面，澳門人口不多，但地域特殊，有 400 年中外溝通的歷史，文化、思想和教育往往得風氣之先，而且又是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風雲人物逃避政治風險之所。因而先進思想火種源源不息，從太平天國、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省港工人大罷工、九·一八事件、八·一三事件等等，澳門均受一定的正面影響。在抗日戰爭前夕，社會已積聚了一股愛國的力量，在教育領域上，星星之火，閃亮了濠江大地，每個歷史時刻均哺育出英才。

維新運動成員陳子褒在澳開辦灌根學校，提倡平民教育、婦女教育、培養了冼玉清、廖奉基、李應林、容啓東等人才；同盟會成員潘才華在澳門辦培基學校，在澳門發展會員，培養了一批義無反顧與革命的仁人志士，如趙連城、梁定慧。1915 年，教育界梁彥明、曾次崔等曾組成“抵制日貨救國會”，逢星期日組織師生到中山各鄉演講宣傳救國抗日。1919 年，澳門學界不能在澳公開反日，卻又有十多校師生，以及童子軍到四鄉宣傳，號召同

胞抵制日貨，奮起救國，“雖有學生被捕而志不稍衰”^②，1922年，成立僅兩年的中華教育會組織三千師生國恥大遊行，振奮人心^③。1931年9·18事件以後，澳門師生的愛國情緒更爲高漲，宏漢學校校長鄭穀詒寫了一篇署名“澳門宏漢小學全體同學”的《致義軍書》，除寄東北軍外，還要求高年級學生人人背誦，銘記國難。當年各校師生高唱《松花江上》等抗口歌曲，課堂張貼“毋忘國恥”等標語，通過週會、時事報告會等，師生同受深刻的愛國教育。

二、澳門教育在國難中大發展

1937年8月31日，即蘆溝橋事變後一個多月，日本侵略者首次對廣州進行空襲。廣州的大學、中學開始向四鄉遷移。到了1938年6月，廣東省遭空襲達2000次，廣州市被轟炸達800多次。在此情況下，不少著名的學校，都被逼遷移。香港和澳門成爲避難的地方。

從1937年開始至1939年初的十多個月內，澳門人口大增，師生人數增幅更大。1936年，澳門人口約120,000人，學生約8,000人。1942年，人口達歷史高峰，估計最高時達40萬；學生則增至3萬人。即人口增幅爲3.33倍，學生的增幅爲3.75倍。

遷到澳門的大多爲私立學校，都是較有規模的。遷校的目的，在於師生的安全與學校續繼運作，同時保存設備，所以一般是師生、設備一起遷移，有的先遷到廣東省內的鄉鎮，及後又遷到澳門，困難不少。

遷來的人口，大多是經濟條件稍好的，例如地主、商人或僑眷。一般工人、農民較少能別井離鄉，拖男帶女異地謀生。因而這一時期遷入的新人口，文化素質也比較高，而且遷來的學校，

不乏廣東的名校，以及過萬的中學生，大批優秀師資，使澳門這一世外桃源，教育事業呈現出一時的興旺。

特別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澳門居民的精神面貌，不管是原居還是新移民，不管是富商名流，還是貧苦人家，高級知識分子也好，目不識丁的人也好，佛門禪院的道長、道姑也好，花街柳巷的歌姬妓女也好，救國救亡，同仇敵愾，愛國精神高度發揚。

抗日期間遷來澳門的中學校

年份	校 名	校 長	校 址	備 註
1937	總理故鄉紀念中學	司徒優	白頭馬路	第二學期校長戴恩賽
1937	嶺南中學	何鴻平	白頭馬路	
1938	執信中學	楊道儀	南 灣	司徒優離紀中自辦
1938	中德中學	郭秉琦	媽閣街 15 號	
1938	培英中學	區茂泮	望廈唐家花園	
1938	協和女子中學	廖奉靈	巴掌圍，高樓下巷	
1938	潔芳女子中學	姚學修	下環龍頭左巷	
1938	思思中學	李 震	南 灣	
1938	教忠中學	沈芷芳	媽閣街	
1938	廣州大學附中	(主任)譚維漢	白馬行	
1938	越山中學	司徒優	白鴿巢前地	
1938	培正中學	黃啓明	賈伯樂提督街	
1938	廣中中學	劉年祐	南 灣	
1939	知用中學	張瑞權	青洲英坭廠	
1939	中山聯合中學	林卓夫（兼）		
1939	南海聯合中學	李兆福		
1939	省臨中④	陳家驥（初在灣仔，後來澳門很短時間）		

除了以上的中學，還有一些小學如覺民小學、德基女子小學、維德小學⑤。

這一時期，還有從京、滬各地以及香港來澳避難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真是人才鼎盛。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教育行列，他們或

受聘於本澳學校，或自己開設私校、補習學校、專科學校、不少爲了糊口，甚麼也得幹。因此，1937年至1941年三年多，澳門教育界獲得了一次大輸血，澳門整體來看，是一次很有積極作用的人口機械增長。

儘管澳門的“戰時繁榮”很快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告終，也儘管香港爲日軍佔領以後，澳門一直被稱爲“中立”地區，而實際上已淪爲一個死氣沉沉的“孤島”。澳門葡政府不得不屈就於日本勢力之下，澳門的抗日救國活動連遭挫折，愛國抗日中堅被暗殺，愛國抗日報刊被迫停刊，百業凋零，米價飛漲，餓殍遍地，下環峨眉街出現人吃人的慘劇，還未斷氣的飢民與凍死的屍骨一起堆出冰仔萬人坑……。1942年的黑色春節前後，澳門人口大量流失，學生銳減，學校紛紛關閉。這一短暫的、三年多點的黃金時代也宣告結束了，但它給澳門文化、教育事業留下深刻的影響。

三、抗日戰爭對本澳教育、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第一，澳門教育素質出現一個飛躍

澳門學生人數從幾千人發展到三萬人，是幾倍的增加，知識分子的數量也大量增加，而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奮起投入各項愛國活動中，使一直被貶爲文化沙漠的“澳門街”出現了風起雲湧的文化浪潮。首先是促進思想素質的顯著提高：

(1) 愛國主義教育空前高漲

這幾年裏，在教師的帶動和教育下，在社會風氣的感染下，中小學生的參與性很高。他們的愛國認識、愛國感情、愛國意志都在參與中得到鍛鍊和提高。1937年8月12日，澳門成立了四界救災會這一抗日救亡組織，首屆稱爲學界，包括了教育界，學生界。

百人代表中首選十一名理事，教師即佔了三席：孔教中學教師李哲夫（即李桂森），聖羅撒女中教師張鐵柔（即張釗、張陽）以及孔教中學校長張志城；在該會開展的各項活動中，教師也是積極參與的。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為四界救災會的名譽顧問、陶英學校校長陳公善在體育義賽中擔任乒乓股負責人，啓智校長陸望明擔任稽核、知行學校教師龍帆蓀、濠江小學教師周筱真等分別參與交際、出納等工作。婦女界的支持者中，也有不少女教師，中葡學校教師崔瑞琛就是婦女會的中堅分子，出任宣傳部勸銷主任^⑥。由於教師的言傳身教，大大鼓舞了學生參與愛國活動的積極性。

（2）學生的思想面貌煥然一新

在記敘四界救災會抗日救亡活動的《濠江風雲兒女》一書中，我們可以從零散的史料中看到：孔教、崇實、公進、聖羅撒、望德、求知、啓智、濠江、陶英、樹人、寶覺、蘭室、紀中、德常、復旦、翰華、育德、平民等校學生的參與。他們活躍於集會、遊行、上街賣旗、維持秩序。學生們還節衣縮食，為前方戰獻金；他們在教師的帶動下，向前方戰士寫慰問信，參加體育義賽，參加文藝義演，參加各種各樣的宣傳活動。這些活動促使這一代青少年茁壯成長，培養了熱心服務精神，鍛鍊了他們在群體中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並且從工作中學得多才多藝，鍛鍊了工作能力和組織能力，更可貴的是在小小的心靈中，深深植下憂國憂民的良種。在抗日救國的滾滾洪流中，那種“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小農意識和習性，受到強力的衝激，已經變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上述 1935 年《澳門華僑教育概況》一文中，概括指出“澳門社會藉嫖、賭、飲、吹四項偏門事業而繁榮”，因而描寫澳門學生在這種社會形態中耳濡目染“蹟近墮落”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大部分學生的思想與行為是絲毫沒有

中國新青年的氣概的。”前後幾年，澳門青少年學生的精神面貌改變真大，這就是抗日戰爭大時代的洗禮！

(3) 喚起民眾，澳門師生發揮宣傳尖兵作用

1937至1940年間，抗日救國工作比較集中在宣傳、捐款、向前方戰士慰問鼓勁等工作。在全澳總動員的巨浪下，師生不甘後人，作出不少貢獻，他們特別利用周日和寒暑假，到廣東四鄉深入宣傳。例如基督教會辦的培正中學，它的學生自治會即在1939年暑假組織了“暴風劇社暑期流動宣傳團”和“培正中學暑期流動演劇宣傳隊”分別到窮鄉僻壤宣傳抗日，他們被稱為“鐵的一群”，爬山涉水，到處奔波，舉行“流動畫展”，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活報劇。他們出錢出力，歷盡千辛萬苦，冒著日機空襲的危險，用多種形式，喚起民眾抗日的決心和信心^⑦。1938年，澳門熱血青年組織回國服務團，直接投身救亡工作，這些團員“大多數是教師、學生、工人、職員……”^⑧，教師張鐵柔、李哲夫、陳少陵、鮑鋼石都帶頭參加。張鐵柔是第二隊的隊長，還因工作出色而獲得表揚。崇實學生林志宏、知行學生何龍清也毅然捨棄安逸的物質生活而投奔戰場。1941年初發生了“皖南事變”，中共領導的新四軍，遭國民黨軍包圍，新四軍九千官兵慘遭殺害。回國服務團的團長廖錦濤也在類似的逆流下被國民黨十二集團軍逼害而冤死，團員們紛紛撤退，但他們的行動和精神，發揮了榜樣的作用，值得我們學習和紀念。

(4) 血薦軒轅，澳門師生用生命寫下壯麗詩篇

皖南事變之後，不但回國服務團的團員被逼撤退，在澳門半公開活動的“抗日先鋒隊”也被逼解散了。但是，抗日救國更需要民眾的前赴後繼。就在這嚴峻的時刻，總理故鄉紀念中學（簡稱紀中）、中德中學和培正中學三個學生自治會挺身而出，在校內積極發展“游擊之友”在支援中山縣五桂山區抗日游擊隊的工

作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後來鏡湖護士學校的學生自治會也加入了積極支援的行列。例如廣游二支隊隊長鄭少康就是濠江中學的體育教師，東江縱隊一位多才多藝戰士徐永鏗（即徐疾）是中德中學學生。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毅然決然投筆從戎，參加了武裝部隊，為澳門教育史寫下最壯麗的篇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澳門師生從戰局中看清了形勢，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寄希望於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分批分散投入游擊戰場。紀中教師陳衡葆和兒子陳壽彭同在游擊戰中壯烈犧牲，堪稱師生、父子兩代忠烈，令人肅然起敬！紀中學生鄭誠之，他是前岐關車路有限公司董事長鄭芷湘胞侄，世家子弟而熱血滿腔，初中時曾在韶關參加蔣經國領導的青年軍，後來失望回澳門紀中讀高中，受《評中國之命運》、《西遊漫記》等書的啓發，第二次投筆從戎，參加五桂山游擊隊，曾一度負傷回澳療養，傷愈迅即返前線。1945年5月在三鄉被敵偽軍包圍，戰鬥到彈盡糧絕，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慷慨捐軀！另一紀中學生賴冠成（又名賴達）曾參加五桂山游擊隊，後到東江縱隊，在戰鬥中被俘，死於獄中。行易學生胡兆基，也在1944年，在一支挺進粵中的粵中縱隊中捨生戰鬥，光榮犧牲。另一夜校學生陳君芝也是參加游擊戰中獻出寶貴的生命。澳門青年教師馮劍青是青年團體負責人，後到廣游二支隊當參謀也在反擊敵偽的頑強鬥爭中犧牲。^⑨

1942年底，澳門中華教育會會長、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被日本漢奸暗殺於龍嵩街崇實中學附近，在白色恐怖下，澳門師生千人執紼，路過日本領事館前側目緩步，切齒睨視^⑩反映了澳門同胞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決心和勇氣，烈士的鮮血不會白流，它換來同胞更堅定的救國救亡的意志。

(5) 澳門教育專業性的大大提高

由於成批的廣東名校，不少全國著名的教育家、文化藝術界雲集濠江，澳門學校的管理水平、師資水平、學校設備水平大大提升，達到一個新高峰。雲集的知識分子中有資深的教育家，推行新式教育卓有成就人士，有學有專長，教學經驗豐富的名師俊彥。上表所列的中學校長中，除戴恩賽、楊道儀為革命志士親屬，而非教育專業人士外，其他均為教育界中辦校經驗豐富者。張瑞權、譚維漢、區茂泮、廖奉靈、黃啓明、郭秉琦、劉年祐、沈芷芳、司徒優等均因教育業績而知名嶺南，來澳繼續主掌戰時校政；還有一部分具有一定行政經驗人士被本地學校羅致，促使本澳教育行政走向全國規範，如陳道根先生被聘為聖若瑟中學教務主任、朱伯英、林範三兩位被聘為聖羅撒女中校長、教務主任，鍾福祐先生任官校教席。當年遷來澳門的還有受歐美教育影響的各所中學，如培正、中德、協和等各有特色，澳門教育界可以多元化採納各種辦校的經驗。

在教學上，許多第一流的師資，直接在第一線培育本澳青少年兒童。被稱為數學四大天王的，竟有劉芙初、胡金昌、潘子湘三人在澳門中學執教，新“四大天王”中也有張兆駟、莫煥基兩位服務於戰時澳門；在文學方面，不少大學教授、名師宿儒也在中學任課，教學水平相應大大提高。如符俊先生、黃漱石先生、歐陽韶先生。後者原為中山大學、華僑大學、廣州法學院等校中文教授；此外，還有孫中山先生大元帥府的秘書連聲海、廣州著名律師王天保以及秦侶尹、鄧肇元、陳賴洪、陶俊棠、林德彰、鄧景范等。在教師群中不乏專門人材，如梁松、李朝炷、鄭祖琦是著名體育教師；梁碧霞、謝不凡、韋國基、張鐵軍、高朝宗、黎保標、黎勁雄等是受過專門訓練的童軍教練；著名的音樂教師也不少，如蕭文、俞安斌；國音（即普通話）導師關玉書、何仲

恭；美術教師司徒奇、何磊……星光閃爍，一時人材鼎盛，其中不少還終身為澳門教育事業服務，使本澳的教學水平大大提高，亦促進了人才的培養。

(6) 校園文化蓬勃發展

在此期間，儘管物質條件極度貧乏，但學生的課餘生活卻十分充實，甚至是多彩多姿的，以抗日為主題的作文、演講、書畫、體育比賽，以抗日為內容的戲劇、歌詠、體育表演十分豐富，使校園文化顯得份外有生氣，學生也從中得到鍛鍊。例如青洲的知用中學，組織了青濤劇社，高歌劇社、春雷音樂社、在青洲區播放抗日歌曲，激勵同學，同時影響青洲居民。知用中學還曾在崗頂劇院舉辦了一連三晚的義演籌款，以救濟中山一帶流入澳門的失學青年。他們的春雷音樂社就請了數學四大天王之一的張兆駟老師當顧問，經常排練操曲；又專門成立合唱團，後來還獲培正尚志、紀中幾校加盟，擴大為澳門學聯音樂社^①活動有聲有色，更有崇高的目標，校內校外互相促進。

這期間的文化藝術活躍分子也是成批地成長，不少成為文藝良種，以後也貢獻良多。

第二、澳門整體人口素質相應提高

(1) 澳門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

教師是社會上最龐大的知識分子隊伍，抗日戰爭期間，教師人數大增，其增幅還大於整體人口的增幅，也就是人口的文化結構優化的體現。學生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學生人數的大增，學生佔人口比率的增加，更是未來人口優化的重要的保證。因而抗日期間由於知識人口的增長而把教育事業推向歷史高峰，而且對整體人口的文化素質提高有積極的作用。

儘管社會經濟十分困難，但國難當頭，國民黨和共產黨也在人民的強烈要求下，一致抗日，澳門社會也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

結成廣泛的抗日隊伍。社會上義學大興，除慈善團體外、宗教團體、廟宇公祠、街坊組織、氏族宗親等，凡有條件的，都積極救濟失學。澳門中華教育會也在這一時期，辦了六所難童義學，附在各校中，發動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之餘，給予逃難來澳的貧童義教。許多一向收費不低的學校，如培正、協和等，也紛紛在校內設立免費、半費學額，幫助有困難的學生。不少中、小學也設有免費夜班，或收容家貧失學兒童，還爲了成年人脫離文盲。義教的隊伍除現職教師之外，還有各中學的學生。形成澳門歷史上一次大力的掃盲活動，人口文化素質的確是顯著提高。

(2)澳門人口思想素質的飛躍

澳門在抗日前、抗日期間，一直是嫖、賭、飲、蕩、吹五淫自由發展之地，成爲海外或珠江三角洲發橫財者的銷金窩，賭場林立，春節賭攤還擺上鬧市，“茶話室”一吸鴉片煙的場所掛著醒目的招牌，那些發戰爭財的奸商，出賣祖國的漢奸走狗經常在賭場妓寨煙館花天酒地……但抗日的洪流在澳門洶湧澎湃，深入民間，有血性的華人都作出不同程度的愛國行動，歌姬妓女中也湧現出愛國不甘後人的事例，紛紛爲支援抗戰而獻金，那位後來當了電影明星的李綺年就是其中一位，大大振奮了民族精神。

一方面由於民族的覺醒，民族大義的宏揚，另一方面由於輸入大量文化素質較高的人口，澳門社會上出現了不少文化層次較高而又能牽動民心的活動，社會風氣不斷更新、昇華。例如嶺南派宗師高劍父及其弟子關山月、名畫家鄧芬、司徒奇、篆刻家鄧爾雅^⑫等。在澳期間，舉辦畫展，招收門生，爲澳門美術園地播下茁壯種子，我國著名畫家關山月的第一個“抗戰畫展”也是首先在澳舉行的，後來才移師香港展出^⑬。關玉書先生熱心推廣國語，與音樂界人士一道，齊心合力拓展了澳門的健康音樂活動，修社、語運合唱團兩音樂團體的延續，正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談

到澳門的戲藝史，不能不追溯到抗日戰爭年代。除了上述的，校園戲劇一時呈現百花齊放之外，社會上不少愛國進步的劇團劇社紛紛組成，而且具有較高的水準。如錢萬里、劉芳等組織的中流劇社，李亨、李嘉的曉鐘劇社，張雪峰、鄧竹筠、陳有后等的藝聯劇團，還有前鋒劇社，綠光劇社，起來劇社等等，盛極一時，影響深遠。

當年還有更高層次的文化活動——讀書與寫作，也風行一時。先後由有志青年組成的“炎青讀書會”、“起來讀書會”、“曉社讀書會”“前哨讀書會”、“密雲讀書會”如雨後春筍，大大促進了青年的業餘閱讀以及自我提高奮發向上的精神，促進整個社會求知求進，關注國家大事的良好風氣。同時還出現了“吶喊文學社”、“焚苦文藝研究社”、“炎青文學社”以及“文化協會”等組織^⑭。澳門青、少年成長的社會環境大大改善，成年人則有更多健康的、積極而高尚的參與機會，並在參與中有所發展、有所發揮。

(3) 民族意識增強，團結自救成為普遍認同的行為模式

由於抗日開始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它本帶有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因而在教育界的行動中，無一不從全民的長遠利益出發，絕大多數的工作，均需喚起群眾、組織群眾而促成，而整個澳門社會層面的抗日救亡工作也是一樣，因而民族觀念、群眾集體觀念有所增強。大家深信群策群力的效能，認同團結自救以解決社會問題的行為模式。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在白色恐怖中，教育界和全澳愛國者一道，仍以團結自救的精神，做了大量工作。例如1943年11月，中華教育會成立“糧食協助會”派代表向政府要求配給平價米糧，分售本澳教職員^⑮，1944年為幫助本澳高中畢業生回內地升學，在缺乏經濟補助能力的情況下，中華教育會仍“另謀”他法，商洽渡船公司免收船費，方

便了當年 50 多名學生升讀內地大學^⑩。抗日戰爭勝利至今已 50 年，回顧戰後的半個世紀，澳門老居民的民族意識、愛國觀念以及團結自救精神，一脈相承，完全可追溯到抗日期間，老一輩愛國同胞的言傳身教。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侵略者宣告無條件投降，澳門教育史上這光輝燦爛的一頁也宣告結束。鑑於其影響的深遠，筆者在本澳文化司署贊助研究的《澳門教育 400 年》十多萬字的書稿中，特別獨立寫下這一篇。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50 週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勝利 50 年週年，本人徵得文化司署同意，提前發表這一章，並得澳門日報社長李成俊先生提供珍貴的口頭史料，全文作了補充和修改。謹此一併致謝。

註：

① 鄧志清，何厭：《澳門華僑教育狀況》1935 年《華僑教育》

② 陳樹策：《全澳成立了抵制日貨會》、《大力抵制日貨，振興國貨》（《五四與澳門》之三，之四）《澳門日報》

③ 香港《華字日報》1922 年 5 月 10 日

④ 省臨中包括原省女師、省一中、省女中學生約 400 人（王植生校長口述）

⑤ 見黎子雲，何翼雲：1939《澳門遊覽指南》P.66

⑥ 散見：《濠江風雲兒女》

⑦ 劉羨冰：《培正學生當上抗日宣傳尖兵》1992.7.16.《澳門日報》新園地版

⑧ 同 ⑥ P.22